

稿件编号：psysci21-421

二审修改说明

(正文修改用绿色字体标示)

作者解决了我上一轮审稿中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作者对本文的修改以及对问题的回复基本是令人满意的。但仍有两个问题作者需进一步解释一下。

1. 首先，在本文中作者将 30 年来 PYD 的发展归纳为“由生态情境取向转向历史文化取向”，这句话似乎有令人误解之处。给人感觉似乎是，过去是“生态情境取向”，后来乃至现在渐渐转变为了“历史文化取向”，难道两种取向在 PYD 后来发展乃至现在发展中，不是共存的吗？作者还需对此问题进行一定解释，此外，作者需注意文中对此问题进行描述时的具体用词。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和专业评审。纵观整个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历史演进，以积极发展的视角关注青少年的优势和潜能，认识到青少年阶段的相对可塑性形成的发展基本力量，是由个体自身和发展情境间的动态作用所塑造的(Lerner et al., 2019)，这构成了 PYD 的核心思想。本文通过对 PYD 研究文献和学术史的仔细梳理，认识到 PYD 自诞生起，就是融问题意识、实证依据、实践品格于一体、并具开放性的发展理论，它包含着对青少年的价值认识、青少年发展的理论机制及青少年发展的实践促进等丰富内容。PYD 涵盖发展过程、方法原理和实践应用三大层面(郭海英 等, 2017; Hamilton, Hamilton, & Pitman, 2004; Lerner et al., 2016)。这表明 PYD 不仅仅是发展领域的一个单维的理论概念，PYD 的发展演进更蕴含了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思想认识、研究方法和实践探究的拓展，PYD 不仅体现在理论、实证层面的探究，更将这种积极观点运用于实践。

根据以上概念并基于 30 年来 PYD 在理论、实证和实践层面上相关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因此本文将 PYD 取向划分为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积极青少年发展属于发展领域范畴，发展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是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其形成源于生态系统理论、发展情境论等发展系统理论的提出(Leman et al., 2017; Lerner et al., 2011)。以生态学理论、发展情境论等为代表的生态情境理论，开始聚焦于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注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为探究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潜在机制提供了全

新的研究视角(Lerner et al., 2011, 2014)。而以 RDS 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取向视角,是着眼于个体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生物、文化和历史组织层面,将以上不同层面的变量整合到一个综合的协同作用的系统之中,其中社会 and 历史文化因素塑造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影响着发展的不同阶段(Lerner et al., 2018)。原文对“由生态情境取向转向历史文化取向”旨在表明 PYD 的发展思想、发展视角和发展方向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延伸至更宏观、更深层的发展情境之中,将不同层面各因素的复杂动态作用机制被纳入探讨,更深入地揭示了个体的多元性发展模式。但确如专家您所指出的,当前的表述确有误解之处,因此我们将其修改为“由生态情境取向逐渐向历史文化取向演进”,更体现 PYD 发展进程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深化和拓展,并相应修改了原文表述不当之处 (绿色字体标出)。这样的考虑妥当否,恳请您指正!

参考文献:

- 郭海英, 刘方, 刘文, 蔺秀云, 林丹华. (2017). 积极青少年发展: 理论、应用与未来展望.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5–13.
- Hamilton, S. F., Hamilton, M. A., & Pitman, K. J. (2004). Principles for youth development. In S. F. Hamilton & M. A. Hamilton (Eds.), *The Youth Development Handbook: Coming of Age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eman, P., Smith, E., & Petersen, A. (2017).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f Child Development o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in Diverse and Global Contexts. *Child development*, 88(4), 1039–1044.
- Lerner, R. M., Agans, J., Desouza, L., & Hershberg, R. (2014). 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2025: A Predictive Review.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1, 255–272.
- Lerner, R. M., Boyd, M. J., Kiely, M. K., Napolitano, C. M., Schmid, K. L., & Steinberg, L. (2011).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dolescence.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1, 169–176.
- Lerner, R. M., Brindis, C. D., Batanova, M., & Blum, R. W. (2018). Adolescent health development: A 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 N. Halfon, C. B. Forrest, R. M. Lerner, & E. M. Faustman (Eds.), *Handbook of Life 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pp. 109–122). Cham: Springer.
- Lerner, R. M., Lerner, J. V., Urban, J. B., & Zaff, J. (2016). Evaluating programs aimed at promoting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 relational development systems-based view.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3), 175–187.
- Lerner, R. M., Tirrell, J. M., Dowling, E. M., Geldhof, G. J., Gestsdóttir, S., Lerner, J. V., King, P. E., Williams, K., Iraheta, G., & Sim, A. T. R. (2019).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Evidence and Absences Studying Positive

2. 其次，作者在修改说明中说“在 2.3 小结部分简要补充了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相关理论的共性、区别及内在逻辑传承”，作者的这一思路是对的。但目前从文中的修改来看，在 2.3 小结部分作者对于两种取向理论的相同点、区别之处尤其是内在传承逻辑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阐述。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作者再次认真阅读文献，对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下的相关理论的共性、区别和内在逻辑传承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详见“2.3 小结”部分。(绿色字体标出)

此外，我们也对全文的文字表述进行了核查，对不通顺语句进行了修改。(绿色字体标出)

再次感谢您的审阅和指导，恳请你批评指正！

一审修改说明

尊敬的审稿专家：

感谢您们对我们稿件进行详细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给予本文以及我们今后的研究和写作很大的启发。兹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改，使之更趋完善，并作书面修改说明如下，敬请赐教。

再次感谢三位审稿专家的中肯意见！

此致

敬礼

作者敬上

审稿专家一意见及相应修改说明

(正文修改用红色字体标示)

作者综合国内外有关文献梳理了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由缺陷模型向积极发展转变的演化、该理论的意涵等三方面的内容，并根据该领域的进展产生了未来该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总体上来说，该综述主题清楚，文章思路层次明晰，较好地反映了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变迁与内涵，但是仍然有以下问题请作者考虑：

1. 第一部分“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背景”作者围绕积极发展理论进行了相关背景的综述，但是建议作者对背景进行梳理，可以重点围绕该理论的产生关键某几个背景进行综述，目前的写作过于简单，没有从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根源来梳理背景。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和专业评审。我们意识到原文对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背景的梳理过于笼统和简略，未能清楚阐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发展科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关键转变之于其诞生的重要性。鉴此，我们完全采纳您的意见，重点围绕推进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产生的关键社会背景和理论发展背景进行阐述如下：

对青少年的系统研究被纳入发展科学领域始于 Hall，而其以“缺陷观”为基础的思想对当代青少年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主流观点下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和实践模式。从社会背景看，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下的引发的弊端逐渐显现，无法消除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同时，甚至还严重损害了其身心发展，导致社会面临较大挑战，也引起了研究者对青少年研究的广泛关注和重新思考。从理论发展背景上，纵观整个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历史演进，以积极发展的视角关注青少年的优势和潜能，认识到青少年阶段的相对可塑性形成的发展基本力量，是由个体自身和发展情境间的动态作用所塑造的(Lerner et al., 2019)，这构成了 PYD 的核心思想。“缺陷观”下的发展理论主要以笛卡尔的分裂观为前提，将遗传与环境割裂，从单一视角研究人类发展(Lerner et al., 2011)，而后发展关系模型（生态情境论、发展情境论等）的提出，为以积极和综合视角研究青少年发展奠定重要理论基础，再到 90 年代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更是 PYD 理论得以诞生的重要背景。(红色字体标出)

参考文献：

- Lerner, R. M., Boyd, M. J., Kiely, M. K., Napolitano, C. M., Schmid, K. L., & Steinberg, L. (2011).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dolescence.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1, 169–176.
- Lerner, R. M., Tirrell, J. M., Dowling, E. M., Geldhof, G. J., Gestsdóttir, S., Lerner, J. V., King, P. E., Williams, K., Iraheta, G., & Sim, A. T. R. (2019).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Evidence and Absences Studying Positive

2. 第二部分中的“4-H 项目”、“5Cs (Five Cs)”等类似的专有名词或术语第一次出现要把全称都写出来。

回应：感谢您的细心审阅。我们再次仔细阅读并检查全文后，对以上术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进行了全称的补充。(红色字体标出)

3. “2.3 小结”部分作者对 PYD 的两种取向进行了简要分析，但是对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理论取向的演变对该领域研究的意义还需深入分析与总结，提出更有意义的观点，而不是重复表述一下两个取向的发展。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首先，在第二部分 PYD 的演进中，我们对两种取向下的理论进行了更详细深入的阐述，并补充了新近文献予以支撑。其次，由于《心理科学》对综述类论文篇幅和字数的限定，在“2.3 小结”部分，我们仍采取简要介绍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相关理论的共性、区别及内在逻辑传承的写法，但结合几位专家的其他意见，在第 3 和第 4 部分进一步补充了理论取向的演变意涵和对该领域研究的意义。

4. 第三部分“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意涵”，建议作者增加一些实证研究给予支撑。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在意涵的三个部分补充了新近的实证研究。(红色字体标出)

5. 第四部分“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演进的启示”部分，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启示与建议，作者较好的从宏观方面进行了架构与建设，但是建议作者对每个方向还需进行具体的阐述以论证。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在启示部分对三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并补充了新近的实证研究予以佐证。(红色字体标出)

6. 近 5 年参考文献需要补充。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在已有基础上，我们对全文各个部分都进行了近 5 年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补充。(详见红色和蓝色字体)

审稿专家二意见及相应修改说明

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只是作者对相关的文献梳理还欠缺一定的条例性，就核心主题的论述也缺少自己的思考。总体评论还有自说自话的痕迹，缺少相关的文献支撑。全文所用文献较为陈旧，对于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选题，前沿性的文献还是必要的。综上，建议退稿。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指正，我们认真吸取您及审稿专家一和审稿专家三的意见，对全文各个部分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补充了近五年的前沿性文献，并进一步梳理和深入总结以提升文章质量。(详见正文红色和蓝色字体部分)

审稿专家三的审稿意见及相应修改说明

(正文修改用蓝色字体标示)

本研究回溯了 PYD 的形成背景和理论演进,论述了 PYD 的理论意涵,并在文中最后提出了 PYD 未来研究的启示。本文研究选题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全文文字叙述流畅,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但本文仍有一些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具体如下:

1. 本文的一个难点是郭海英(2017)、常淑敏(2013)、李曼玉(2013)等论文中都对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作者如何突破前人已有的综述研究写出写的内容,凸显本文的创新之处。在郭海英(2017)一文中提到了发展情境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发展资源理论、心理弹性理论,在本文中提到了 PYD 的生态情境取向、PYD 的历史文化取向,作者须思考,在有关理论的介绍上本文与郭海英(2017)相比,有何创新推进之处?在论文自我检查报告中,作者认为,与郭海英(2017)相比,“本文的推进之处:本文聚焦于 PYD 的理论演进和理论意涵……”。实际上,郭海英(2017)研究亦介绍了发展情境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本文介绍的 PYD 的生态情境取向(发展情境理论)、PYD 的历史文化取向(关系发展系统理论)与郭海英(2017)研究介绍的内容是否有显著的区别与提升?郭海英(2017)研究应该介绍的是 2016 年之前国外 PYD 的研究进展。五年过去了,不知国外 PYD 有关研究有何新的发展?建议作者进一步搜索国内外最新文献,进一步总结最近若干年以来 PYD 有关研究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回应:感谢您的专业评审和宝贵意见。积极青少年发展属于发展领域范畴,发展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是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其形成源于生态系统理论、发展情境论等重要发展系统理论的提出(Leman et al., 2017; Lerner et al., 2011)。诚如您指出的,郭海英等(2017)也介绍了相关理论,为了解 PYD 的理论背景已经提供了清晰的内容陈述。然而本文的出发点在于梳理和呈现 PYD 理论的发展演进脉络,而非一一详细介绍各个发展理论。在仔细梳理和阅读与 PYD 相关的文献后,我们将 PYD 的理论发展归纳为生态情境取向向历史文化取向的深入演进。在理论的介绍中,对于生态情境取向,深入阐述了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理论和发展情境论。对于历史文化取向,我们将视野着眼于整个 PYD 发展进程,对当前引领当代发展科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关系发展系统元理论进行了介绍,该理论是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通过深入研读相关文献,提炼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新近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理论意涵进行了阐释,我们遵循历史与逻辑

统一的方法论，从发展哲学、科学和实践层面出发，旨在回答如何认识青少年——如何研究青少年发展——如何促进青少年发展这三大核心问题。另外，我们对近五年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补充予以支撑。(蓝色字体标出)

参考文献：

郭海英, 刘方, 刘文, 蔺秀云, 林丹华. (2017). 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应用与未来展望.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5–13.

Leman, P., Smith, E., & Petersen, A. (2017).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f Child Development o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in Diverse and Global Contexts. *Child development*, 88(4), 1039–1044.

Lerner, R. M., Boyd, M. J., Kiely, M. K., Napolitano, C. M., Schmid, K. L., & Steinberg, L. (2011).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dolescence.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1, 169–176.

2. 在郭海英（2017）的综述论文中提到了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四个理论，即发展情境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发展资源理论、心理弹性理论。但为何本文的理论演进只叙述了发展情境理论与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发展资源理论为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理论，在本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掉。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再次研读相关文献及基于发展资源理论的近几年的实证研究，我们将发展资源理论的简要阐述置于RDS理论框架下，并补充了新近实证研究予以支撑。(蓝色字体标出)

3. 不知PYD有关理论的演进是否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能否概况出每个阶段的典型特点？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本文主要将PYD理论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阶段。这一划分是着眼于发展科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基于实证和应用研究方向的变化。在两个取向阶段中，本文阐述了最具代表性的发展理论，并补充了新近文献予以支撑。另在“2.3 小结”部分简要补充了生态情境取向和历史文化取向相关理论的共性、区别及内在逻辑传承。

4. 在论文自我检查报告中，作者在本文中将30年来PYD的发展归纳为“由生态情境取向转向历史文化取向”，作者这样概括有无具体依据与证据？“由生态情境取向转向历史文

化取向”这句话似乎表明在过去的某个阶段更多是生态情境取向占主导，目前在逐渐向历史文化取向转变。但发展情境理论、关系发展系统理论二者在时间发展方面，似乎并非是一前一后的关系。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诚如您指出的，发展情境论和关系系统理论在时间发展方面并非前后关系。本文将视角着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将 30 年来 PYD 的发展归纳为“由生态情境取向转向历史文化取向”，这一划分是着眼于发展科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基于实证和应用研究方向的变化。尽管发展情境论和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在时间发展方面并非前后关系，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关系发展系统元理论成为当前发展科学领域的的前沿理论(Lerner et al., 2019)，对青少年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应用实践的关注是当前 PYD 研究的趋势所向(Lerner et al., 2011; Moore, 2017)。关系发展系统元理论是对生态情境论、发展情境论的整合和深化，由微观至宏观层面各因素的复杂动态作用被纳入探讨，促使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深入地揭示了个体的多元性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Lerner, R. M., Boyd, M. J., Kiely, M. K., Napolitano, C. M., Schmid, K. L., & Steinberg, L. (2011).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dolescence.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1, 169–176.
- Lerner, R. M., Tirrell, J. M., Dowling, E. M., Geldhof, G. J., Gestsdóttir, S., Lerner, J. V., King, P. E., Williams, K., Iraheta, G., & Sim, A. T. R. (2019).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Evidence and Absences Studying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4(1), 1–14.
- Moore, K. A. (2017). Commentary: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goes mainstream. *Child Development*, 88(4), 1175–1177.

5. 在文中作者说“PYD 自诞生起，就是融问题意识、实证依据、实践品格于一体的发展理论”、“PYD 的演进本身蕴含着对青少年认识由问题转向积极的根本性变化”，这两句话中一句话说 PYD 具有“问题意识”，另外一句话说 PYD 蕴含着对青少年认识由问题转向积极的根本性变化，似乎这两句话有点矛盾之处？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诚如您所指出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转向积极”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矛盾之处。前者原意意指 PYD 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发展背景中，“缺陷观”下以消极视角看待和消除青少年负面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还原论、机械论等影响青少年发展研究的局限性的显现，由此产生的问题推动着 PYD 的形成；后者意指 PYD 的产生

促使人们逐渐转变对青少年的消极看法，不再唯以问题行为消除为根本目的。因此，为避免语义上的歧义，我们将“问题转向积极”改为“消极转向积极”。(蓝色字体标出)

6. 文中还需补充一些信息，例如 PYD 理论的具体提出者、时间、标志性事件等。介绍 PYD 的几种具体理论时候应该叙述清楚以下几点内容：代表人物、核心理论观点、实证证据、理论的演进发展阶段与过程等。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正文中介绍的发展生态学理论、发展情境论、关系发展系统元理论、发展资源理论的代表人物、时间、核心理论观点、实证研究等进行了补充。(蓝色字体标出)